

禅学对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影响与互渗,不亚于它的宗教价值。

禅与唐宋诗学

■张 晶

我对禅学,并无宗教方面的兴趣。如果从宗教的意义上讲,我可以基本上是个“门外汉”。我对禅,却有很浓的哲学的、美学的乃至诗学的兴趣。

1985年,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硕士毕业的助教,收到“第一届全国严羽学术研讨会”的请柬,我非常珍视这个学习机会,便非常认真地准备会议论文。从何人手呢?于是研读严羽的诗学代表作《沧浪诗话》。从中找到了一个角度,那就是诗与禅的比较。因为严羽自己就说得非常清楚:“以禅喻诗,莫此亲切。”这是对严羽诗学思想研究的最佳提示。我由此得到领悟,写成了《诗与禅:似与不似之间》,后来收在《严羽学术论文集选》(鹭江出版社1987年版)中,这是我探索诗禅关系的起点。

我从小就喜欢古诗,现代诗都拿来读。在“上山下乡”那段不堪回首却又记忆犹新的日子里,一天艰辛的劳作之余,是一部《唐诗三百首》和一些旧的《诗刊》,伴我度过寒冷的冬夜。硕士期间读的是唐宋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唐宋诗词。自己以前也喜欢写诗,上大学时还写

了不少“朦胧诗”,因此对唐宋诗词有一份情有独钟的深爱。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研究《沧浪诗话》为契机,对诗禅关系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体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学对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影响与互渗,不亚于它的宗教价值。中国的唐诗、宋诗之所以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排除禅的影响的。最典型的当属王维、孟浩然、刘长卿、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的创作。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染禅的情况非常普遍,禅在很深的层次上影响着文人的心态。这种心态又使唐宋诗人、词人的作品,呈现出特有的审美风貌。如盛唐的山水诗派诸人,大都是与禅有较深关系的。禅使这些诗人有了一份淡泊的心境,才有了山水诗的那种空灵明净。

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思想,禅宗固然有着来自于印度佛教思想的渊源,但更是与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相融合的产物。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与玄学的合流,是后来禅宗思想的基因。支道林、谢灵运、宗炳等人的佛学思想,其实都

不无玄学的影子。般若学的“方便假想”,深受“体用不二”思想的启迪;道生的“顿悟”,尤与庄学、玄学有不解之缘,而至禅宗思想的产生与丰富,可以说是佛学中国化所达到的浑然无间的境界,也是中国的士大夫们所乐于接受的思想方法。禅的“拈花妙谛”,禅的“活参”“妙悟”,不仅与诗的灵感相通,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使唐宋诗人的艺术思维产生了飞跃。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动而空,空故纳万境”(苏轼《送参寥师》),非常睿智地揭示了禅的“空静”观与诗境的关系。禅是超越的,但却并不脱离世俗生活。“平生万物不留物,在家学得忘家禅”(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在现实生活中即世超越,这正是禅的精神。《维摩诘经》中有着颇为有趣的譬喻:“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华。”“又如植种于空,终不得生,粪壤之地,乃能滋茂。”“譬如不下巨海,终不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作为禅宗的精神宝典,这种“烦恼即是菩提”的命题,深深地影响着唐宋时期士大夫们的生活态度,从

而也形成了在生活境像中返照,对“此在”的生存取一种审美观,如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柳宗元的“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苏轼的“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等均是。

唐诗在意境上远远超越了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从质实到空明灵动,这是中国诗歌艺术史上的一个飞跃。如王维的“白云回望合,青霭人看无。分野中峰顶,阴晴众壑殊”(《终南山》)、“澄波澹将夕,清月皓方闲”(《泛前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泛》)、孟浩然的“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常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题破山寺后禅院》),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与诗人们的禅思是大有关系的。

禅学思想中的“任运自在”“随缘自适”,是文人士大夫度过人生困

厄、消解心理焦虑的“良方”。尤其是身处贬谪境遇之中,禅的“随缘自适”“任运自在”的思想,帮助士大夫们度过那些饱经坎坷的岁月,也使他们的诗词创作中冲融怡然的审美情趣。如白居易的“外累由心起,心宁累自息。尚欲忘家乡,谁能算官职?宜怀齐远近,委顺随南北,归去诚可怜,天涯住亦得”(《委顺》)、柳宗元的“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旦携谢山人至愚池》)、苏轼的“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

禅学对诗学理论的影响与渗透更是显而易见的。这当然以《沧浪诗话》为代表。《诗话》中的“禅道贵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的著名命题,已将诗禅之间的相通之处揭出。禅对诗学介入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在儒家诗教之外另开了一条诗学研究之路,即更重视诗人的艺术思维和诗歌境界的探索。《诗格》(署名王昌龄)的“三境”、苏轼的“空静”说、叶梦得《石林诗话》中的以“云间三种语”论诗、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中的四种“高妙”和“白悟”说,都是受禅宗的直接影响而提出的新的



《美学与诗学——张晶学术文选》(六卷本),张晶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定价498元

诗学命题。这些命题所阐述的诗人的审美心胸和诗歌的审美境界等,都与儒家诗教相去甚远。应该说,禅学对诗学的介入,在中国诗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禅与唐宋诗学之间的因缘是很难说得透翻,本书所涉,也只能是一鳞半爪而已。这些年来,这个方面的专著和文章时可见到,各有建树,而我的这本小书虽则粗疏,却是自己含茹而来,略有心得:

京华秋意已深,片月青天,白云自在;以思无思之妙,返思灵焰之无穷。

现存乾嘉时期著名学者卢文弼著述全面而系统的整理成果。

卢文弼著述的重要价值

■陈东辉

卢文弼(1717-1796)乃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学识博洽,著述宏富。卢氏在学术上的最大成就,在于校勘古书,他所校校题跋的书籍达三百多种。卢文弼的学术成就正在逐步受到关注,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是相对于卢文弼在学术领域的巨大贡献,以及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比,无论是关于卢氏之研究,还是卢氏著述之整理,都还是远远不够的。

有鉴于此,我们对现存卢文弼著述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其最终成果就是笔者主编的《卢文弼全集》。《卢文弼全集》是浙江文献集成大家全集系列之一,并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共计16册,近412万字,包括《群书拾补初编》《群书拾补补遗》《仪礼注疏校》《经典释文考证》《重校方言》《钟山札记》《龙城札记》《读史札记》《抱经堂文集》《抱经堂诗钞》《抱经堂集外佚诗文》《常郡八邑艺文志》等。

另外,桂馥为钱大昭《广雅疏义》所作之序中有云:“今海内治《广雅》者三家:一为卢先生文弼;一为王先生念孙;一为钱先生大昭。”段玉裁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卢公嘉志铭》中提到,卢文弼之著述中有《广雅(释天)下注》二卷。但关于卢文弼《广雅注》之下

落,则鲜有人论及,以致许多学者认为《广雅注》未传下来,或者认为《广雅注》就是收在《广雅义疏》中的卢文弼之注,还有的学者认为《广雅注》并未成书。事实上,《广雅(释天)下注》目前还存有清抄本,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原书缩胶卷题作“广雅疏疏,十卷,清抄本,三册,存二卷,九至十中”,未署作者。江庆柏的《关于新发现的卢文弼〈广雅注〉抄本》(《文教资料》2016年第2期)一文,通过详细而深入的考辨,认为清抄本《广雅疏疏》即卢文弼《广雅(释天)下注》。除了该文所提及的证据之外,笔者还发现了一条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卢文弼曾在致王念孙之书信曰:“向有意欲论《广雅》,畏话训之烦难,乃从后逆推而上,已成第九、第十两卷。中遭大故,继复为它事所夺,阁置又五六年矣!”我们据国家图书馆清抄本加以整理校点,收入《卢文弼全集》。同时,该清抄本之天头,尚有钱大昕、钱大昭、丁杰等与卢文弼交游甚密的同时代学者之案语,我们也加以整理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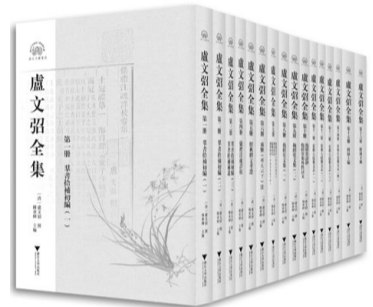
《卢文弼全集》所收各书均有重要价值。如,《钟山札记》《龙城札记》和《读史札记》(附《论学札记》十则)乃性质相近之学术笔记,篇幅均较少。然而这三种札记的价值均甚高,材料翔实,考证精当,创获迭见,精彩纷呈,堪称清代一流学术笔记。尤其是《钟山札记》,乃卢氏生前亲自编定并刊刻,我们认为它是卢文弼著述中总体水平最高的一种。值得一提的是,《钟山札记》有数则关于古书体例之条目,价值甚高。关于古书之体例,余嘉锡《古书通例》乃公认的高水平权威著作。诚然,余著作为在大学讲义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学术专著,其系统性以及涉及范围远超卢著,但卢著成书早于余著约一个半世纪,它的发凡起例之功应予充分肯定。笔者长期为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典文献学”和“目录学”等课程,发现有关教材、专著在论及“古书大题多在小题之下”这一问题时,几乎都要引用卢文弼之说,足见其影响之巨,价值之高。正如现代出土文献能够给高邮王氏《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中的考辨提供有力的佐证,出土文献同样证明了卢氏之说的科学性。同时,这三种札记中还有不少关于校勘学的精湛理论。如《钟山札记》卷一《蔡中郎集》曰:“凡传古书,当一仍其旧,慎勿以私见改作。如《蔡中郎集》有宋天圣元年欧静所辑本,虽未必尽合于隋唐之日,然在今日已为最古,后日重刻,便可悉依旧

式。或有当补者,可别附于后;当刊者,可著其说于篇下,斯得之清代一流学术笔记。尤其是《钟山札记》,乃卢氏生前亲自编定并刊刻,我们认为它是卢文弼著述中总体水平最高的一种。值得一提的是,《钟山札记》有数则关于古书体例之条目,价值甚高。关于古书之体例,余嘉锡《古书通例》乃公认的高水平权威著作。诚然,余著作为在大学讲义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学术专著,其系统性以及涉及范围远超卢著,但卢著成书早于余著约一个半世纪,它的发凡起例之功应予充分肯定。笔者长期为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典文献学”和“目录学”等课程,发现有关教材、专著在论及“古书大题多在小题之下”这一问题时,几乎都要引用卢文弼之说,足见其影响之巨,价值之高。正如现代出土文献能够给高邮王氏《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中的考辨提供有力的佐证,出土文献同样证明了卢氏之说的科学性。同时,这三种札记中还有不少关于校勘学的精湛理论。如《钟山札记》卷一《蔡中郎集》曰:“凡传古书,当一仍其旧,慎勿以私见改作。如《蔡中郎集》有宋天圣元年欧静所辑本,虽未必尽合于隋唐之日,然在今日已为最古,后日重刻,便可悉依旧

式。或有当补者,可别附于后;当刊者,可著其说于篇下,斯得之清代一流学术笔记。尤其是《钟山札记》,乃卢氏生前亲自编定并刊刻,我们认为它是卢文弼著述中总体水平最高的一种。值得一提的是,《钟山札记》有数则关于古书体例之条目,价值甚高。关于古书之体例,余嘉锡《古书通例》乃公认的高水平权威著作。诚然,余著作为在大学讲义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学术专著,其系统性以及涉及范围远超卢著,但卢著成书早于余著约一个半世纪,它的发凡起例之功应予充分肯定。笔者长期为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典文献学”和“目录学”等课程,发现有关教材、专著在论及“古书大题多在小题之下”这一问题时,几乎都要引用卢文弼之说,足见其影响之巨,价值之高。正如现代出土文献能够给高邮王氏《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中的考辨提供有力的佐证,出土文献同样证明了卢氏之说的科学性。同时,这三种札记中还有不少关于校勘学的精湛理论。如《钟山札记》卷一《蔡中郎集》曰:“凡传古书,当一仍其旧,慎勿以私见改作。如《蔡中郎集》有宋天圣元年欧静所辑本,虽未必尽合于隋唐之日,然在今日已为最古,后日重刻,便可悉依旧

最有分量的一部校勘学著作。该书仿《经典释文》之例,从群书中摘录字句,考辨异文,共校正补遗经史子集四部书计四十种。《群书拾补》校勘与补遗并重,其校勘成果多为后人所采用,如吴士鉴《晋书斟注》就吸收了不少《群书拾补》中的校勘成果。《群书拾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卢文弼校勘学方法、思想和成就,受到了同时代及后代学者的高度赞誉,如钱大昕在是书序中有云:“凡所校定,必参稽善本,证以它书,即友朋后进之片言,亦择善而从之,洵有合于颜黄门所称者,自宋次道、刘原父、贡父、楼大防诸公,皆莫能及也。”另如,《仪礼注疏校》不同于卢文弼的一般校勘之作,而是既有校勘内容,也有研究心得,在一定程度上业已具备著作之性质。该书考证博引,创获迭见,系清代《仪礼》学的重要成果之一。

《抱经堂丛书》本《经典释文》及其《经典释文考证》受到学者的重视和好评。杨军、曹晓云的《〈经典释文〉文献研究述论》(《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一文认为:“清代校勘《经典释文》最重要的成果是卢文弼的《经典释文考证》三十卷。”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校点时发现,《抱经堂丛书》本《经典释文》中的卢文弼之校勘,



《卢文弼全集》,陈东辉 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定价1980元

有溢出《经典释文考证》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因《经典释文考证》在《抱经堂丛书》本《经典释文》刊布之前已先成书,而卢文弼在后来的校勘(包括刻成之后的校勘)过程中又有新的发现。由此亦可窥视卢文弼之精益求精。因此我们在利用卢文弼之校勘成果时,应该同时关注《抱经堂丛书》本《经典释文》本身以及《经典释文考证》,二者缺一不可。再则,卢文弼的《重校方言》是在丁杰校本之基础上完成的,它与戴震的《方言疏证》,被公认为清代关于《方言》的最具价值的两个校本。

另外,卢文弼曾经手校《十三经注疏》,而今天我们见到的阮元主持编写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包含了卢文弼的校勘成果。因此,卢文弼在《十三经注疏》校勘史上贡献甚大,具有重要地位。这一学术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并加以进一步深入研究。

将两个相距遥远的空间世界联系起来作一番文明成长的历史与现实对话。

“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

■刘鸿武

一种文明,或一种文化,其生存演化所追求之最高境界,无非是两个维度:一曰空间上得其广大,二曰时间上得其长久。

空间上得其广大者,为此文明不仅有创新不竭之活力,且极具广博开阔之包容性,可将广大地域里各种各样不同之人类族群与文化联结于一体,虽有差异而相安共处,虽有个性而友善并存,故而此文明得在空间上见其扩散传播,最终形成一个幅员辽阔、地域广袤、色彩斑斓之大型文明共同体。

时间上得其长久者,为此文明不仅起源极古老,强盛一时辉煌熠熠,且极具坚韧刚毅之历史延续性,可历千难万劫而复兴,如源远流长之滔滔江水,奔腾而不息,长流而不断,所谓“苟日新,又日新,再日新”,故而此文明得在时间上跨越千秋万世,开万世之太平。

那文明何以得广大,何以得长久?这在理论上似乎是个千古之谜、难解之题。不过,在中国千百年

来多民族国家建构与文化关系演进的独特过程中,或许隐藏着破解这一千古难题的某些谜底:非洲大陆各族群在其漫长文明创造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自己的本土智慧与知识及天人交往合作的古老传统。今天,我们把这两个相距遥远的空间世界联系起来作一番文明成长的历史与现实对话,尤其是从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边缘文化的角度来看一看遥远的非洲大陆,来对这一历史谜题作一番转换视野的新解读,或许正是一次风景特殊的思想“旅行”。

《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时空内容跨度很大,涉及中国西南边疆和热带非洲大陆两个相距遥远的文明文化演进过程中有关“天长地久”“国泰民安”“四海一家”的一些最基本问题。之所以能把这两个遥远世界放在一起相互对照和比较讨论,一是因为中国西南边疆特别是云南边地的少数民族与非洲大陆一些地区和民族在民族历史文化、社

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形态的某些方面可作对比观察,可从学术上开展跨文化的区域比较研究,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治学过程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国家的巨大变化给了我这种长期观察与比较研究的机会与可能。本书取名“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大体上表述的就是我长期行走于中国西南边疆、非洲大陆、中国江南的研究道路上的一些个体经历,以及于个体经历中对于中国和非洲民族、历史、文化、社会诸般事象之所见、所闻、所思。

为什么从中国边疆的角度来看非洲大陆呢?非洲和中国都是人类文明重要起源地,双方交往亦源远流长。然近世以降,中华追逐欧风美雨,对非洲则亦跟随西方话语。非洲人对于中国的认知也曾大体如此。今日中国重返世界,当重建有关域外的全球知识新体系,由跟随西方言说的旧格局反

转为中国现代性与全球史言说的新方式,按照这个世界的本原与真实的生活实践,实事求是地重新去理解中国、理解非洲、理解世界,从中国言说世界的新话语,从而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原创性成长。而要做到,一个重要前提是需要适当转换我们旧有的观察视野与知识形态。在以往很长一段岁月中,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始终不全面不充分,常常将欧美等同于世界,同时对于自身的认识其实也不全面不充分,常常将中原内地等同于整个中国,将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凡此种种知识缺陷与认知盲区,使人们在很长时期中“言必称欧美,话必说中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天,我们需要跳出这样的认知藩篱,登高而望远,既要全面认识好外部世界,也要全面认识好自身,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把握未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能从过去关注不多的中国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角度来对望一下遥远的亚非拉文明,那或许从一个侧面预示着中国学术拓展域外思想和知识新天地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文明以远,当化成天下,四海一家,本天下大同。中国和非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文明区域,无论过去还是未来,双方之发展于人类历史整体进程都关涉深远。如果说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广阔的中国西南、西北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过去的第三世界”和“今后的新天地”,那么广阔的非州大陆就是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过去的第三世界”和“今后的新天地”。所谓“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如果说中国之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内地与边疆、东部与西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那么同体同种,世界之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亦将取决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古国与崛起强国能否与亚非



《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刘鸿武 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定价89元

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建构起合作共赢、共生共存的命运共同体,并以此去化成天下、包容世界、开万世之太平。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对非战略、中非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与遥远非洲在发展领域合作的有力推进,将是当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发展战略”的最佳观察窗口与实践场所,这个战略实现好了,对于中华文明之求其广大、求其长久,对于中国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意义不言而喻。